

尴尬的“人”：思想史研究中的思想者

□ 陆敏珍

内容提要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者大体可以划分为属于内部的思想与属于外部的人的行为两个层面。在既往的思想史研究中,前者那些有关人们的观念与感受,从来是思想史研究视域中的焦点,而后者那些活动中的人在思想史研究的历程中总是处于不断地被捡起、被抛弃以及再次被捡起的过程中,形成了思想史研究中极有意思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当研究者试图将外在世界中的行为与内在的思想联系起来,并试图建立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时,思想史研究中又出现了新的路径。文章通过梳理思想史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者的“内”与“外”,来窥探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变迁。

关键词 中国思想史 思想者

作者陆敏珍,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杭州 310028)

虽然思想史一直被认为是边界不清的学科,近年来,关于思想史研究对象、范围与方法的讨论仍然为数众多。这些观察与总结在相当程度上概括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进程与学科定位,为研究者提供了借鉴与前瞻。但是,如果稍稍偏离对学科定位

的热情,而从思想史家本身的研究状态中去探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具体实践,也许可能更为清楚与直接地触及思想史研究中的问题。例如,思想史研究中的思想者该如何处理,即令人深思。

为了避免论题的涣散,本文对于思想者的讨

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年版。

④《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导论部分所讲的思想史的写法。《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⑤《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⑥《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8页。

⑦《经学的时代意义》,载《中国经学》(第 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⑧参见《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任务》,载朱维铮编《周瑜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⑨《孔颖达〈五经正义〉“体用”义研究:经学义理营构的思想史考察》,载《中国经学》(第 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⑩杜维明:《经学的时代意义》,载《中国经学》(第 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⑪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⑫蒋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 2003年版。

⑬《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版,第 92页。

⑭《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66页。

⑮《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第 4页。

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第 186页。

⑰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 244页。

责任编辑 董希望

论仅限于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者,而不打算将这一论题延伸到作为思想史家的研究者本人。然而,即便是在这一相对清晰的界定中,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思想者,或者说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本身,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如果将思想与思想者进行有意的隔绝,毫无疑问会引发争议,思想与思想者毕竟是不可分割的。这里,柯林武德的一个论说可以借鉴。他说:所谓的历史都是人事的历史,因此,研究过去任何事件的历史学家,可以将一个事件划分为事件的内部与外部。属于可以用身体和它们的运动来加以描述的一切事物即是指事件的外部;只能用思想来加以描述的东西即事件的内部。^①显然,用事件的内部与外部来分析历史中的人事,避免了引向关于“人”的概念的矛盾。

沿着柯林武德的思路,思想史研究中的思想者大体也可以划分为属于内部的思想与属于外部的人的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在既往的思想史研究中,前者那些有关人们的观念与感受,从来是思想史研究视域中的焦点,而后者那些活动中的人在思想史研究的历程中总是处于不断地被捡起、被抛弃、以及再次被捡起的过程中,形成了思想史研究中极有意思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当研究者试图将外在世界中的行为与内在的思想联系起来,并试图建立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时,思想史研究中又出现了新的路径。因此,探寻思想史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者的“内”与“外”,可以窥见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变迁。

一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早期阶段,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者是否需要区分“内”与“外”并不是一个彰显的问题,人们关心的是如何找寻这一思想家的思想与其他思想的关系,并试图纳入一种体系或排列中。

在中国,思想史早年是以“学术史”的名义登场的。1929年,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后来钱穆的同名著作,均属于既是学术史也是思想史的研究,叙述时以人或经典著作作为编排纲式,述学者的生平、师承、宗旨、思想演变等。十年后,蔡尚思《中国思想史研究法》出版,该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以思想史命名的研究,该书称“序述各时代思想的体系、派别,及其演进的进

程,是为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s)”^②。

当然,从学科发展过程看,与中国思想史具有更紧密关系的还是哲学史,因此,在追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时,更多人愿意从中国哲学史上去根究。^③1919年胡适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④按他自己的说法,“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⑤,在书中,胡适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⑥而冯友兰于1930、1933年写的《中国哲学史》则称自己是依据西方的哲学范式,“将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与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⑦。在这种哲学式的观照下,思想史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要讨论那些根本而永恒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往的思想家与他们的经典著作中已有相关的讨论,研究者所要做的是去研究和阐释这些经典文本,“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⑧。

综观各家所论,无论思想史是作为“学术史”、“思想史”还是“哲学史”的面相,思想者的“思想”是主要的研究单位,研究者将思想家散见的思想系统化,并得出一些结论。而通过比较时间序列中的思想家,研究者往往将思想家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当作是历史延续性的表现,他们的不同之处被看作历史变化或发展,由此构成了中国的“思想发展史”^⑨。

虽然思想者的“内”是主要的观察对象,但思想者的“外”并没有被研究者所忽视。这一时期的学术史、哲学史在注重学说的内容时,也注重师徒传授的派别,以个人为中心的学者传记等,在体例上多少带着传统史学以个人为中心的学案体的痕迹。^⑩而反映在具体的写法上,那些被学术传统确立为思想史系谱中伟大的“光荣榜”或“点鬼簿”中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就成为组织排列资料的线索主干,“大的思想家一章,小的思想家一节,仍不够等级的话可以几个人合伙占上一节,再不济的话也可以占上一段……思想的历史也就自然成了思想家的博物馆……一半仿佛编花名册,一半仿佛挂光荣榜”^⑪。这种“花名册”或“光荣榜”的优点是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思想家及其思想,缺点是思想家之间的联系往往暗淡不清,难以呈现思想史自身的深层发

展逻辑。尤其重要的是,虽然思想者——作为外在的“人”的姓名、生平、事迹,一一详备,思想家的“内”,即“思想”亦是研究课题,但研究者并不关注外在的人与内在的思想之间的关联与交集。甚至,所谓的将思想家的“外”亦纳入中心课题的讨论其实不过是一种曲解,因为真正居于中心的还是对思想者“内”的解读,外在的“人”虽然出现在镜头前,但人不过是叙述“思想”或“哲学”的方便轴线。思想者隐在思想背后,面目模糊不清,宛如去了肉的骨,架成了思想史研究的框子。因此,当研究者尝试着去追寻思想脉络,或思想本身发生关系的“自主过程”(autonomous process)时,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者的“内”与“外”就被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凸显出来。

二

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对于思想者“内”、“外”的有意区分与西方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是息息相关的。

在西方,晚至1939年,“思想史尚未成为一个普遍的用语”^②。但观念史却是被明确界定过的用语。观念史的奠基人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说:观念史“与哲学史相比较,它既更加特殊一些又范围更为宽泛一些,……在大部分情况下它和思想史的其他分支运用的是同样的资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在先的劳动者的劳动”^③,他提出要将“单元-观念”(unit-ideas)作为观念史研究的基本单位,考察各个单元观念出现、孕育、发展和组合进入各个思想体系的过程。^④因此,观念本身有了某种独立的生命力,观念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并不依赖于人类活动,思想家不过是“观念”暂时寄居的母体。这样,在观念史的讨论中,思想者的“外”被完全摒弃在思想史的课题之外,思想者的“内”成了唯一的研究对象。

但是,中国思想史界对观念史的追随却是在完全不同的设问中展开的。

也许,将“观念”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在中国思想史界的展开首先是源于哲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尴尬所造成的。金岳霖评论“中国哲学”的困难时曾说:“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么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⑤而钱穆则直言:“中国并未有纯正哲学。”^⑥

但是,哲学的诱惑没有让中国哲学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相反,人们开始寻找另外的解释来论证中国哲学的模式。与胡适当年以西方哲学为普遍模式的观点来考察中国哲学问题相别,后来的人们更相信人类可以有不同的哲学模式,西方哲学只是其中的一种,中国传统可以有与西方哲学不同的中国哲学。因此将中国古代思想以中国哲学的名义选取出来,“道”、“心”、“性”、“理”、“气”等中国典籍中固有的词汇被当作中国哲学问题被研究者有意凸显出来,通过对这些观念的内在展开,中国哲学形成了自己的叙述框架,并成为后来国内治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们一种约定俗成的研究路数。当然,这种“中国哲学史”取径下的中国思想研究并非接续洛夫乔伊的观念史而来的。这种研究虽然也讨论传统中国思想观念的内在结构及发展历程,讨论“道”、“心”、“性”、“理”、“气”等观念是否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思想家的思考之中,但是并不注重思想家在具体社会条件下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思考努力。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这种研究将上述基本概念当作是迁移于不同时代、民族和文化的思想家之间的,这些概念自身有其发育成熟的过程。这种研究路数与观念史固然明显有相类之处,但是研究者所厘清的中国哲学基本概念,显然与洛夫乔伊的单元-观念(unit ideas)所强调的“起作用的思想习惯”、“影响人们的反思进程”、“对各种各样形而上学激情(pathos)的感受性”、“追寻哲学语义学”、“可以加以分离和认同的观念”^⑦等特性是有差别的。

真正接着洛夫乔伊的单元-观念而来的,应当是余英时“内在理路(inner logic)”的提法。但余先生对于中国思想内在理路的设想是在反对单纯用外缘分析来解释思想演变的情形下展开的。1975年,他在一篇关于清代思想史的讲演稿中说,五四以来在解释清代的学术演变时,学者往往从政治观点(例如“反满”意识、反理学)与经济观点(例如市民阶级说)的外缘来解释,而这种解释是不完备的;除了外缘之外,还应该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转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这种“线索条理”就是他

三

所说的“内在理路”^⑩。后来,仿照洛夫乔伊“单元—观念”的做法,余英时提出了清代学术思想史中的七组单元—观念,包括“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经学与理学”、“经世致用”、“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博与约”、“义理、考据、词章”、“六经皆史”^⑪等加以考察。而将“内在理路”的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应该是余先生1970年代的著作《论戴震与章学诚》。1990年代,本书再版时,作者将相关研究增订其间,以作为“内在理路”研究路径的集成。

内在理路的提法,将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者的“内”与“外”进行了区分,它所提供给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方法上的启示、影响与争论显然超过了余先生的预料。虽然余先生不断强调“学术思想的发展不可能不接受种种外在环境的刺激”^⑫,但后来的人们,无论是追随者还是质疑者似乎更愿意去误解他的说法。追随者更偏向于内在理路的叙事框架,甚至将之极端化,认为“外在历史对观念的内在史没有什么助益”^⑬。质疑者则认定余英时的“内在理路”取“内”舍“外”,强调政治、社会等外缘的因素终不容忽视。^⑭对于这种误解,余英时后来一再解释,并强调他关于内在理路的构想“不过是为明清的思想转变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而已,它不但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效的外缘解释,而且也可以与一切有效的外缘解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余先生相信人们对于内在理路的评论是自然的,但误会需要重申。^⑮然而,余先生可能没有想到,人们并不是没有读到他的申明,并不是误会他的原意,也不是没有看到后来他在外缘因素上的努力^⑯,而是当时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迫切需要方法上的讨论,正如余先生所指出的,在他提出“内在理路”是“思想史的一个客观组成部分”之前,“以前的外缘论者也多少接触到了它,但没有达到自觉的境地,更没有在这一方面作过比较系统的、全面的探讨”^⑰。内在理路的提法无疑将已有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切分,使原来隐然其中的论题显性化,启发了中国思想史的讨论契机。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观念史取向中,研究者将观念作为自主演变的过程,而人对于历史过程不复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外在的“人”——借用柯林武德的话,属于身体与它们的运动的那部分——彻底地淡出思想史的叙述框架。

如上文所言,基于对将思想史化约为简单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的不满,借用于西方治思想史的观念史途径,中国思想史界出现了内在理路的研究进路。而在西方思想史界,基于对观念史的不满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研究路向已然形成并影响到后来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早在1950年代,当观念史成为西方思想史界的主流研究范式时,史华兹就对观念史提出过异议,他承认观念史研究的效果,但主张将观念放在人类所处的生活环境的脉络之中进行讨论,使之作为研究的中心课题,举凡制度、技术成就、政治环境等等,均是这一环境的一部分。^⑱他后来更是用 history of thought 着意区分与 history of ideas 以及 intellectual history 的差别也是这一想法的具体实践。^⑲

1960年代,西方思想史界,特别是政治思想史出现了大量对观念史取向的讨论。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认为在观念史的范式下,主体被取消,历史成了“观念的角斗场”,在这样的取径下,“我们无法得知某一特定观念在某一思想家的思想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也无从知道这一观念在其环境中是处于中心还是边缘。也许我们知道某一表述在同一时期旨在回应不同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知道该表述究竟要回应什么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人们继续使用该表述”。^⑳他提出“语境中的观念(ideas in context)”的说法,主张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仅是去研究经典文本,而必须从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的背景下去考察,只有通过对文本意涵(meaning)与语境(context)的结合才能真正理解观念。这样,“语境”就成为该学派颇具标识性的提法,在政治思想领域造成了方法上的大变革,并形成了新的研究思想史路数。后来,斯金纳所代表的研究范式被称作“斯金纳式的革命”^㉑主导着西方思想史的研究。

美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呈现出同样的研究路向。二十世纪90年代,针对着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流行的内在论、观念史取向,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就明确提出“我研究中国思想史,主张‘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㉒,他反对简单地将思想化约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也反对观念和价值决定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理论,认为“不沾

人间烟火的思想”是靠不住的,“文化的创造和再生产里所牵涉的,不只是自主的‘个人选择’,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脉络的确会造成差异”,他强调自己的研究不是“追问‘正文’(text)里观念的普遍‘意义’,而是要解明这些观念如何显现当事人所处的特定‘脉络’(context)”^①。

在以往中国思想史界,“语境”一词及其概念虽未提出并阐释,但相同的涵意早被表达过。例如陈寅恪所指出的“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则其学说,不易评说”^②。这种历史地理解古人的学说,与“语境”论者提出的历史地理解思想如出一辙。近年以来,中国思想史方法论上的思考,例如葛兆光“回到历史场景”的提法,^③强调“将思想放回历史语境中,重新建立思想的背景”^④,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语境的研究路径。

在“语境”的研究中,由于要体会思想者的意图与语境,不仅思想家的经典文本成为研究对象,思想者也被推到了前台。作为思想承载的主体,思想者的生活环境与言说背景均成为研究者借以构建语境的重要资料。在这一思考背景下,变化一直相对迟滞的思想史资料呈现出多样性来,文集、书信、日记、笔记、小说、图像、考古资料等材料均成为研究对象,^⑤思想者的“外”在这些材料的映衬下,前所未有的丰满与鲜活起来。在语境的研究中,思想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结合,例如与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的关系逐渐紧密,艾尔曼主张从新文化史的角度来扩大思想史的范畴,^⑥葛兆光则认为思想史应该站在哲学史、政治史和社会史之间。^⑦中国的思想史从最初的“学术史”演变到了“思想文化史”,思想史依据着外援又找到了革新点。

然而,极具吊诡的是,当外在的“人”不断丰满的同时,对内在思想研究的偏失似乎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例如艾尔曼运用新的研究范式试图重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语境,当他以清学儒家学派的今文学派为考察对象,研究清学转向今文经学的政治脉络与社会环境,当逝去的人终于重回历史舞台时,思想史研究的实践却出现一种逆转,即艾尔曼所建构的似乎只是“没有思想的思想史”。从无人的思想史研究到人出现后无思想的

思想史研究,理念指导下的具体研究所出现的尴尬显然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与此相反,1970年代提出内在理路,1980年代转向外缘因素分析路数的余英时显然找到了更好的着眼点来贯通内在理路与外缘因素的交互分析方法。他在关于朱熹的研究中说,此研究并非是关于学术史、思想史的内在研究,注意的焦距是儒学与政治、文化以至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关联与交互作用,即将儒学放置于当时的历史脉络之中以观察其动态,如此,才有可能重建朱熹所曾活跃于其中的真实世界。^⑧余英时强调自己的研究是关于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他所要建立的不仅是儒家思想本身,还需要掌握的是拥有此观念的人在历史语境中是如何行动的。虽然是书一出,引起了大量的争论,但在他的研究中,外在的人,尤其是作为思想者的外在的活动清晰地呈现在历史的脉络中,作为思想家的人逐渐变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生活中的许多痕迹开始作为析论的材料,而内在的思想在丰富多彩的历史情景中也获得了呈现。这种视角与叙述方式无疑是值得注意的。

四

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而言,思想者的“内”与“外”在具体研究中所呈现的面相——从最初无分思想者的“内”、“外”,到随后对“内”的有意着重,再到后来对“内”、“外”因果交集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发展理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这个过程并不是对整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概括;其次,这一过程也不是一个逐层递进的研究传统。受语境论挑战的观念史仍然延续着自己的方式,同样,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史研究亦自成其章。因此,研究者本身的实践过程中,并不能截然划分,兼受沾溉是很自然的。或者说研究者所应具有的,是斯蒂芬·柯林尼(Stefan Collini)所说的那种心境:去寻找自己独立房间的独特与合理之处。^⑨虽然事实上,思想史的独立房间并不是个人的努力所能企及的。

注释:

①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9、300页。

②蔡尚思:《中国思想史研究法》卷首;又见《陈中凡

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 页。

③事实上,对是否选用“哲学”一词,中国早年的学界是颇有犹豫的。(参见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而在撰著的命名上,思想史与哲学史的两个名词中互通互用的例子持续到了 1980 年代,例如侯外庐 1980 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史纲》,早在 1963 年出版时,就采用了《中国哲学简史》之名;而李锦全等 1962 年出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73 年补充修改后易名为《简明中国哲学史》出版。除此之外,一些标明为哲学史的著作,例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在后人的观照下,也不过是“名为哲学史,其实只是由一位哲学家本其哲学素养而写成的思想史”(陈启云《两汉思想文化史的宏观意义》,载《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下册,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59 页。)

④虽然后来由于对“哲学”一词是否可以应用于中国的怀疑与讨论,作者撰写该书卷中时,放弃“哲学史”的名称,改称“思想史”。(参见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⑤尽管三年前上海中华书局曾出版过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一书,但胡适以“开山人”自居,显然有其深意。

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收入《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 页。

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 9 24 页。

⑨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 年第 1 期。

⑩常乃惠:《中国思想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⑪《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 9 页。

⑫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思想史之目标与方法》,《当代史学研究》,李丰斌译,台北明文书局 1982 年版,第 111 页。

⑬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页。

⑭《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

⑮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后附金岳霖《审查报告》,第 5 页。

⑯钱穆:《中国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 1982 年版,第 1、2 页。

⑰《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第 5~14 页。

⑱《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本文曾收入《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6 1992 年版,后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改版时,收入是书。

⑲《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收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⑳《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第 210 页。

㉑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4 页,注 53。

㉒参见河田悌一:《评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史林》60 卷 5,岛田虔次:《历史研究入门》,京都同朋舍,1983 年版。余英时在自己的书中说,此二人对内,在理路进行了详细讨论并且有正式见诸于文字的评论。(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版自序,北京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3 页。)

㉓《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版自序,第 3 页。

㉔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取的就是外缘的研究路径。

㉕《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

㉖史华兹:《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张永堂译,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7 年版,第 6 页。

㉗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 页,注释 1。

㉘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2002 p 61 p85

㉙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李宏图,胡传胜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 页。

㉚汪晖、艾尔曼:《谁的思想史》,《读书》1994 年第 2 期。

㉛艾尔曼:《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2 年第 12 期。又见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代中文版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9 页。

㉜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507 页。

㉝葛兆光:《回到历史场景:从宋人两个说法看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分野》,《河北学刊》2004 年第 4 期。

㉞葛兆光:《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史之间——读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书城》2004 年第 1 期。

㉟在中国思想史研究资料的多样性上,葛兆光作了相对多的探讨,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4 期;《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 年第 4 期。

㊱《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第 430 页。

㊲《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史之间——读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

㊳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北京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4 页。

㊴斯蒂芬·柯林尼、波考史、昆廷·斯金纳等:《什么是思想史》,任军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

责任编辑 董希望

ABSTRACTS

Grasp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istic Core Value Scientifically(*Liao Yuwe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2) **Three Poin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ic Core Value**(*Lei Yun*, Zhejiang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Circles) (4) **Marx and Engels' Outlook on "Universal Values"**(*Hu Chenghuai*,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and Party Construction,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Zhejiang Committee of the CCP) (6) **Values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m**(*Lan Weiqing*, China Scientific Socialism Academic Society) (8) **On the Socialistic Basal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Socialism**(*Chen Huax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Zhe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 **Carrying forward the National Spirit Is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the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Zhou Guangxun*,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12)

Definition and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Thought

— **Take Cases of Ming Ru Xue An and Song Yuan Xue An for Examples** (15)

He Jun (The Center for Song Studies a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Abstract It is hard to define the history of thought since the subject is invisible and complicated. Although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should be open, the concrete study of which needs regul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Ming Ru Xue An and Song Yuan Xue An, the two foundation book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thought are taken as examples in this article, in which the pattern and content, style and method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and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history of thought under the impact of pursuit of knowledge and value are discussed.

Keywords History of Thought, Pattern, Content, Style, Method, Ideas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A Discussion on the Study Focu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21)

Fan Lizhou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The Chinese culture should be viewed as two partly separated domains which influence each other rather than a unity of the upper-class culture and the low one. The two domains are just "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 After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hinese culture, religion and the systems of knowledge had taken on a clear stratification. The task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studying is just to mediate the "great tradition", and elucidate the implications of "little tradition". Now the most urgent jobs are 1)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2)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oughts, 3)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value of the study of folk belief, 4)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study of folk culture. In conclusion, the study focu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should be both 'Up' and 'Down'.

Keywords Great Tradition, Little Traditio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Politics, Folk Belief, Folk Culture

Embarrassed Thinker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25)

Lu Minzhen (The Center for Song Studies a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n China, thinkers as the subject of research can be defined two parts: thought inside and behavior outside. The former, whose ideas and feelings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topic during past studies. The later, whose movements and activities are often taken into account sometimes by researchers, then out of the discussion and come into the study once again. More important,

when researchers connect the behavior outside with the thought inside, and try to build the causality between them, new approach and mode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appear. This paper looks back the change of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inside to the outside of thinkers and tries to pursue the process of history of thought in China.

Keywords History of Thought; Thinkers

On Legal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

(31)

Zhou Gangzhi (Law School,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The mechanism of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s based on the system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one country. Legal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 as a method for legal interpretation, means that the interpreter should choose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scheme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 Under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have powers of co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authority of interpreting constitution, and legislative power, so the people court can infer the constitutional wills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al legislation. Thus, legal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 is the same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 based on constitutional legislation, which provides new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dogmatics.

Keywords Legal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Dogmatics;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German Law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39)

Xie Libin (Law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Abstract Since the Lüth-Decision of German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it is regarded that basic rights constitute an objective order of values, which also binds civil, crimi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Under this theory, interpretation of laws must conform with the constitution. In this sense, laws under the constitution have been widely constitutionalized. In China, academic debate over legal interpretation conforming with the constitution is in the ascendant. German experiences tell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w shall conform with the constitution. However, there is no institution which makes sure that judges interpret law in line with the constitution. What is more, the requirement that interpretation of laws shall conform with the constitution means essentially an external limitation imposed on judges as well as legal scholars of the respective fields. Therefore resistance against this requirement is unavoidable, which mak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theoretically self-evident position impossible.

Keywords Constitutionalisation; Interpretation of Law in Line with the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Basic Rights

On Binding Legal Interpretation Harmony with Constitution at the Institutional Angle

(45)

Zheng Lei (Guanghua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8)

Abstract Constitutional review organ should choose the one which is the best in harmony with Constitution from the others. We call that as "binding interpretation harmony with constitution". This method is used to interpret both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to avoid unconstitutional decision, and it is one type of constitutional judgment. However, "legal interpretation harmony with constitution" is the method use by the judiciary. The two interrelated methods are the same in principle, but different at the institutional angle. They could do their best only if they had a perfect cooperation. On the contrary, "legal interpretation harmony with constitution" could do nothing if "binding interpretation harmony with constitution" were neglected.

Keywords Binding Interpretation Harmony with Constitution; Legal Interpretation Harmony with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Constitutional Review

Formal Credit, Planting Scale and Farm Productivity

(53)

Zhang Haiyang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